

## 中外文学交流史的侨易视域

——叶隽著《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北欧卷》

张琳

按照侨易学的核心要义，物质位移导致精神质变，中外文学交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和典型的侨易现象。交流就会产生“交易”的可能，而考察作为交流对象的侨易主体的前世今生，用叶隽教授的概念来说，即考察侨易主体的“向度变型”与“格义立型”的过程，自然应是交流史写作的题中之义。作为方法的侨易学注重“取象说异”、“察变寻异”，进而“观侨阐理”，以期达致“二元三维一大道”的“道”字，无疑给交流史的写作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与理论方法。作为“侨易学”创始人的叶隽教授在侨易的视域下观照中外文学交流史，正是这部《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北欧卷》的最大特色。

侨易学试图打破线性思维、强调多元立体的思维方式，通过侨易主体链性网状结构的勾连成型，促使我们将关注的目光放大开来，从而形成一个宏大开阔的空间视域。就《中国－北欧卷》的书写而言，作者首先将北欧的概念锁定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以丹麦、挪威、瑞典三国为核心，然后将作为日耳曼文化支脉的北欧放置在日耳曼整体文化单元中来考察，正如作者所说，他是有明确的建构意识的，“希望通过对德国、奥国、北欧诸重要日耳曼分支文化区的探讨，来逐步逼近作为整体的日耳曼文化”<sup>①</sup>。在这样的整体性视域中，作者追溯“北欧精神”的“德国原像”，以斯特林堡、易卜生、汉姆生、安徒生、勃兰兑斯为个案，同时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场域中鲁迅、周作人、胡适、

<sup>①</sup> 叶隽：《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北欧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87页。

茅盾等知识精英的相关论述，凸显出以瑞典、挪威、丹麦三国的代表作家为中心的北欧精神的德国烙印。但是，作者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将目光还又落到中国乃至世界。在叶隽教授看来，按照文化的结构体系，就日耳曼文化单元来说，德国是它的中坚区域，有着它的中坚思想，即深层的哲思精神和理想的世界情怀，而“这种日耳曼文化区甚至欧洲场域的精神流转并未能就此止步，非物质的思想意象源自于为物的人，但却显然又超越于个体之人而有了自身的精神生命，所以它们还要不断远行，走出欧洲，走向世界”<sup>①</sup>！在作者看来，鲁迅、陈寅恪等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具原创性的人物，乃是借助了世界现代文明巅峰的德国文化资源的给养。在这里，德国资源不仅作为连接中国与北欧文学文化交流的中介意义，其文化“中心”的意义亦得到凸显。纵览全书，我们会发现，世界的眼光和胸怀始终是全书一以贯之的基调。作者尤其认同闻一多“世界文化”以及歌德“世界文学”的概念。后者的名言是：“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而前者更是提出了文化融合的过程性规律。世界文化是一盘大棋，北欧文化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参照，作者说得明白：“总结前贤留下的宝贵经验，过一遍少受重视的北欧经验，乃至完成前辈未竟之业，追索北欧文学所反映的知识与思想来源，乃至日耳曼文明的元思维模式，其意义可能不仅关乎中国本身，也关乎世界未来走向的大势。”<sup>②</sup>

如果说以上是针对全书的宏观构思与气象格局而言，那么在具体的运筹层面，“网链点续”的立体思维在安徒生、易卜生和斯特林堡等个案的研究中露出端倪。关于“安徒生童话该怎样翻译？”，作者将现代中国的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立体事业，将周作人、叶君健和叶圣陶视为安徒生入华的三重“侨易推手”，分别从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翻译和创作的三重维度考察了安徒生这一“侨易新符”在现代中国儿

① 叶隽：《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北欧卷》，第132页。

② 同上书，第150页。

童文学语境中的构建过程。作者高度肯定安徒生的童话，将其放置在格林兄弟-豪夫-安徒生的日耳曼艺术童话谱系中来理解其文学史和思想史地位。在作者看来，“安徒生的童话写作，绝不仅是为儿童服务，他更有着广阔的世界胸怀和人类理想，他希望借助童话的方式，用另类的诗意书写，给世界提供一种可能的方式和路径”<sup>①</sup>。所以，安徒生其实是以童话写作参与了世界文学的建构，而作者每每以世界眼光处处关怀本民族的创生发展，在“安徒生符号”的资鉴下，作者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指明了一条出路：“在现代中国的语境里，这种符号不仅需要，而且具有独特意义。因为相比较成人世界的纷繁喧闹，儿童文学显然还是过于寂寞和单纯了。然而，在这童话的世界中，也不仅有着儿童自家的喜怒哀乐、欢歌笑语，也还完全可以为成人沉重的社会生存提供减负和出路的可能，如果能打通两者，使成人世界和儿童文学合二为一，彼此相容，或许更可将诗意提升到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sup>②</sup>

侨易空间不仅包括现实的场域，还包括看不见的精神场域，这是“场域空间的变形维度”。“一方面，是一种可能线性的‘理论旅行’路径”，“另外就是多点发散、群集交错，就是事物发展不是单线、单向度的，而是多元、多线、多维度，甚至立体交叉、多重博弈的。”<sup>③</sup>就现代中国的外国文学在场，或者就个中作家的思想版图而言，其中各类知识资源往往或博弈，或游戏，或交融，显现出非常复杂的景观。而“网链点续”的立体意义恰恰就在于在复杂的场域中能够尽可能地向我们勾连呈现出较为完整的整体图景，通过牵涉关联性的关键环节的把握，使得复杂的侨易现象得到展现和阐释。比如就曹禺来说，易卜生的核心作用应该强调，即便如此，但作者进一步追问，曹禺又是在怎样的比较框架下来认知和接受易卜生的呢？透过考察曹禺自述，作者得出他其实是从整体的世界文学谱系中来把握易卜生的位置的，认为易卜

① 叶隼：《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北欧卷》，第42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99—100页。

生前承莎士比亚，后启萧伯纳、奥尼尔等，如此便帮助我们清晰地看到曹禺至少是在西方戏剧史的整体谱系中来汲取养分的。再者，与易卜生比肩媲美，“隐匿在偶像背后的偶像”斯特林堡的意义呢？作者指出，他在中国的影响力同样是通过以上“网链点续”的方式实现的，而且他在西方戏剧史上的社会网链更为宽广阔大，有德国凯泽、魏特金德的线索，也有英美奥尼尔、萧伯纳的线索，而且郭沫若、洪深和曹禺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接触到了斯特林堡。所以作者大胆作出假设，在曹禺等人的知识谱系中，或许未尝不存在潜在的斯特林堡 - 萧伯纳 - 易卜生的戏剧图谱。

在这里，作者其实进一步深入地给我们提示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消解主体”。当我们在讨论外来资源影响时，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其实很难直截了当地断定某个外来作家一定影响了本国某位作家的某部作品，或者说某位作家的某部作品一定受了谁的影响。我们往往在某人某书中似乎看到谁的影子，但又缺乏足够的例证，这便使我们陷入了解释的困境。在作者看来，这正是侨易学可以提供某种思路的地方，即消解主体。所谓“消解主体”，“主要是指消解以人为中心，尤其是以个体的人为中心的思路，而凸显为某种观念、某种思想”<sup>①</sup>。就以上曹禺对西方戏剧资源的汲取来说，他的个体思维的形成其实并非点对点那样简单，而是多点共生、群集交错，因此，作者认为这时侨易主体就不仅仅是人而已，或许北欧文化的包容性更大，甚至日耳曼文化圈是一个更好的概念。再譬如，在“勃兰兑斯批评该怎样学习？”一章中，作者指出从鲁迅到韩侍桁与李长之，虽然他们之间有碰撞和冲突，但他们在勃兰兑斯身上都共同看到了一种“北欧精神”，即“一种虽然身居北岛而胸怀全局的融入勇气，是一种虽为小国却不甘自弃的创造精神，是一种直面社会现实而立定诗性创造的文化反思力量。”<sup>②</sup>除此之外，他们同样都具备对整个日耳曼文化，尤其

① 叶隽：《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 - 北欧卷》，第 63 页。

② 同上书，第 64 页。

是德国的资源意识。在作者看来，正是这些构成了“主体消解”之后的“大道或存”，而这种融通的思维也正是侨易学消解主体的意义所在。

事物总是处于变化发展之中，但是在不断的变的背后又存在一种不变的规律可循，这是“变创”与“渐常”的道理。“也就是说在移动、运动的过程中产生变化，同时又有不变之道横亘其中。探求这样一种变与常的关系，是我们要考察的核心内容，更直接地说，就是侨、变、常三者之间的关系。”<sup>①</sup>具体到文学文化关系史的研究，考察文学文化在流入异质文化的旅行侨动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同时我们亦不应忽略侨像自身的规定性维度。在侨易的思维框架下，作者以授者-受者的二元结构将作为理论资源的侨易学观念细分，为文化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引入了“向度变型”与“格义立型”的概念。其中，“向度变型”中的“向度”，作者指出：“所谓‘向度’既指一种方向、类型，同时也还带着维度、程度的含义。也就是说这样一种文化变形本身不是毫无目标、方向乃至规律的，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掌控性、可依循性。所以，即便是在强调凸显受者主体功用、汲取外来资源、实习化用创新的主色调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却背后有其或谓‘不变’之规则在作用。”<sup>②</sup>在此基础上，“向度变型”“主要指由于授者原相的规定性因素，乃在受者本身的积极接受过程中，而导致其在接受国语境里发生了有限制性的不同维度的‘模式式’的变化，或者说就是有些类似符码功能的变化。”<sup>③</sup>相比凸显授者的“向度变型”，“格义立型”则更多地强调与之相对的受者的一面，强调凸显其作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之接受性。在此书的写作中，作者将研究重心落在现代中国知识场域中的文学精英的实践需求上，力图勾勒出众声喧哗的中国场域：“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等几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将一律披挂登场，而叶圣陶、叶君健、

① 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3页。

② 叶隽：《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北欧卷》，第7页。

③ 同上书，第8页。

邓广铭、张芝联等也勾连出有趣的线索，至于冯至、刘大杰、李长之等日耳曼学者则提供了北欧文学接受的可能之专业化途径。”<sup>①</sup>在如此强调受者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作者根据授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思想史上的地位，兼顾国别分配，对北欧精英易卜生、安徒生、勃兰兑斯、克尔凯郭尔、比昂逊、斯特林堡、汉姆生，甚至德国精英如海涅、尼采等与北欧文化有密切关联者进行了不同侧重的考察。如此，作者在将问题延伸到北欧领域时，通过考察北欧文学精英的“向度变型”和现代中国知识精英的“格义立型”，以一种灵活的方式，向我们呈现了现代中国外来影响的广泛性以及多重博弈因素，加深了我们对北欧精神的理解。

侨易学试图打破学科的界限，倡导学科间的交融融通。它强调“‘既入学科之内，亦出学术之外’，以‘求真’的精神和意志来面对现代知识生产制度和体系这个庞然大物，以‘求智’的原则来面对世事扰攘的喧哗与干扰，它既有助于开发思维的多重层面，也能帮助我们在混乱复杂的世相之下把握问题的本质。”<sup>②</sup>侨易学这种超学科的意识，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大千世界接近真理的思考和探知方式。作者正是将这种侨易思维贯彻到本书的研究写作之中，将翻译史、文学史、思想史、留学史、传播史、知识史和学术史等相互交叉，同时引入了文化关系史研究、符号学、接受美学等的基本观念。譬如作者谈到易卜生和安徒生进入中国后的符号化功用；通过考察《安徒生童话全集》的翻译者叶君健的翻译及其创化，确立了其在翻译史、文学史与交流史上的意义；作者注意关注戏剧的重要传播媒体——舞台，充分认识到“娜拉”这一文学镜像在侨易过程中不仅有各种文学文本的“形象重建”，还包括走向多种媒体样式的“舞台效应”。新媒体与时代密切相连，一旦将一种新媒体纳入视野，牵连起的必定是更为广阔的知识、社会与艺术场域，从而便开拓和丰富了阐释的空间。当作者发现问题

① 叶隽：《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北欧卷》，第8页。

② 叶隽：《变创与新常——侨易学的观念》，第103页。

最后不得不聚焦到人物个体本身时，个体的知识形成过程则显得至关重要，如此则教育史，尤其是留学史的背景自然成为作者难以回避的考察的重要环节。就北欧文学东渐，作者指出留美之胡适，留日之周氏兄弟、郭沫若等都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而留欧学人在北欧文学的译介方面反倒没有显得特别突出。具体到不同的案例，在第一章的“易卜生戏剧该怎样理解？”中，作者以胡适、鲁迅的讨论为中心，结合各自的留学背景，在易卜生的东渐过程中，强调了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留日学人的发凡起例之功。作者认为“周氏兄弟之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异军突起，自然与其留日背景密切相关，虽然胡适那代人以留美经验而迅速在文化场域获得大名，但若论及对西学的接触迅速和涉猎广泛，其实不如留日学人。”<sup>①</sup>作者将周氏兄弟乃至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一代人放在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的代际传承谱系中来看待，而作者之所以如此看重并强调留日群体的意义，乃在于作者对“假途移植”的关注和问题意识。“这种假途移植的方式往往会因为了每次转译过程的文化语境转换及其相关因子的契合，而产生出特别的文化创造意义来，端在于当事者是否有此自觉之意识。周氏兄弟无疑是此种佼佼者，他们的学养和意识都出类拔萃，故此能在日后大浪淘沙的文化场域中脱颖而出。”<sup>②</sup>这一思路也是翻译研究经历“文化转向”后试图作出的突破。而作者在谈到留学的意义时，这其中也有反思。譬如作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最最重要的创造性天才的代表曹禺就并没有留学的经验，作者进而提出并分析了有关留学史的重要命题：留学背景是否重要，又在多大程度上显示其重要性？

以上着重从侨易学二元三维、网链点续的立体思维和宏大视域、“消解主体”的思路方法、“向度变型”和“格义立型”概念的提出以及打破学科界限、提倡学科间融通的侨易学超学科意识四个方面谈了此卷以侨易学的视域观照中外文学交流史写作的特色所在。通观全

① 叶隽：《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北欧卷》，第13页。

② 同上。

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撒盐于水、润物无声的功力，虽以侨易学的观念为参照，在分析中又不硬搬相关方法，以清晰的问题意识贯穿全书，使得材料跟着问题走，问题因为材料自然调整，以一种灵活的方式，向我们充分展示了中国－北欧文学交流，尤其是北欧知识资源在现代中国知识精英的整体养成、在文化场域的客观意义以及参与中国现代性建构方面的丰富画卷。在我看来，叶隽教授的一部交流史的最大贡献或许在于其提供的巨大的方法论上的启发。作者将翻译史、文学史、思想史、留学史、传播史、知识史和学术史等相互交叉贯穿，但其实，如果将它们各自独立，一部翻译史、思想史、留学史等等未尝不可以这样写。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